#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朱战辉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关键词：**渐进城市化；阶层分化；半工半耕；城乡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8)01－0069－09

## 一、发现农村：农民城市化研究的视角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深化，城乡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另一方面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断显现以及农民多元化程度的提高，而这两方面的变化正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发生的。2015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56.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要达到 60% 左右。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市化的持续快速推进，同时也面临着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艰巨任务，需要实践和学术层面的持续关注。

城市化研究的主要视角还是单一的城市视角。城市视角是在市民权的主导话语下展开的，以城市市民为参照对象，认为农民工城市化是指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系统，并且获取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最终转化为城市市民。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转化，也不仅仅是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1]。然而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并不那么顺利，会出现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以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为表现形式的“半城市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2]。城市视角和市民权话语下，认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应当通过制度性改革推动农民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具体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3]。城市视角强调了农民工的市民权，对于改善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状态以及实现完全的城市化有重要意义，但

**收稿日期：**2017－09－21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8.01.00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ID030）

**作者简介：**朱战辉（1989—），男，河南商丘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E－mail：zhuzhanhui28@163.com

是城市视角对市民权的单一强调,却忽视了农村与城市化的关联。贺雪峰在国际比较以及长期经验考察中,发现了农村对城市化的积极意义,新中国的基本制度安排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制度红利,应当充分利用[4]。因此在农民城市化的研究中纳入农村视角,扩展了城市化研究。农村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资源支持与保护,不但在物质等方面形成了"新农村支持城市",而且也保护了农民工的返乡权利,是城市化的蓄水池与稳定器[5]。不同于城市视角对现行制度体系的完全否定,农村视角认为农民城市化是一个过程,而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都不具备吸纳大量农村人口完全城市化的条件,而保护弱势农民权益及限制城市人口和外来资本占有农村资源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构成了"人的城市化"的制度基础,激进的制度变革并不利于人的城市化的实现[6]。

农村视角是城市化研究的新拓展,强调农民城市化的渐进过程,以及农民进城过程中农村与城市化的关联,突出农村对于农民城市化的积极功能和意义。农村视角偏重于从微观的农民家庭进城实践以及宏观的制度基础来进行讨论,研究内容的扩展还不足,对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及其与城市化的关联关注不多。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的进程是同时发生的,已有研究关注到了城市化进程对中国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的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生活加速了村庄土地流转,推动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的重构[7]。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农民多元化已经是当下农村的现实,然而对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及其与农民城市化的内在关联机制的研究却很少。农民城市化是一个渐进过程,本文从农村阶层分化的视角,立足于对一般农业型地区经验调研的基础,分析农村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对于农民城市化行为的塑造,在城乡社会场域中,探讨农民进城选择的动力及策略,以期扩展城市化研究中农村视角的丰富内涵。

## 二、村庄阶层分化与农民城市化

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的比较早,农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水平也较高,是我国农村和农民城市化的先行者。但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城市化处于起步和快速推进过程中,同时中西部农村占全国农村的大多数,也是典型的农业型地区,是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以及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点区域,代表了我国城市化的一种重要模式。本文以对晋西北A乡为期20天的经验调研为基础,探索中西部地区农民城市化的状况和模式。

### (一)区域概况与农民生计

A乡地处晋西北地区,如同广大中西部农村一样,是典型的农业型乡镇。A乡所在地区没有煤炭等矿产资源,也没有发达的工商业环境,县域经济以农业为主。全乡不到一万人,人均土地7亩,以种植玉米、土豆和各类杂粮为主,由于地处平川地,耕作方便,并且粮食产量较高,但是只能种植一季作物。农户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九十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农民外出务工才开始并且逐步增多。与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一样,农户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首先在家庭劳动力分工就业方面,形成了典型的代际分工模式,一般是中老年人在村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进城务工。其次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由于户均土地有二三十亩,农业收入构成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部分,同时务工等非农收入也在逐步增多,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家庭经济的积累与发展作用越来越突出。最后,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成为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基本模式,由于务工和务农都难以支撑起家庭发展的目标,因此代际分工和代际支持是家庭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保障,也是支持农民逐渐进城的基础。根据A乡各村调研状况来看,近几年农民进城买房快速增加,有30%以上的农户在城市购买了房屋,同时购房群体还在不断增加,但是购房进城农户在各阶层的分布状况及行为逻辑存在差异。

## (二)村庄阶层分化与农民城市化状况

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越来越多元化,农户经济分化越来越明显,村庄社会阶层结构逐步显现。贺雪峰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把农村阶层划分为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等[8],杨华也根据农户对土地的占有状况对农村阶层分化状况进行了划分[9]。根据 A 乡的经验调研以及相关研究的启发,以农户的就业类型和对土地的依赖状况,对城市化背景下农村阶层分化及其城市化状况进行了如下划分。

脱离土地阶层。脱离土地阶层是村庄的上层,从收入来源看,上层农户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村庄之外的非农收入,而土地收入只是家庭经济的补充甚至已经没有农业收入部分,家庭年收入一般都很高,在 10 万元以上。在就业方式上,上层农户长期在村庄之外工作,大多数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或者经商、承包工程以及从事煤炭运输,家里的承包地或者完全流转,或者作为父母的口粮地由父母继续种植。不论是家庭经济收入方面还是就业方面,上层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很低,并且有逐步脱离村庄和土地的趋势。村庄彻底脱离土地或者对土地已经没有预期的上层农户,在中西部村庄中并不占据多数,一般占村庄农户的 10% 左右。由于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上层农户基本都在所工作生活的城市里购买了房子,与农村和土地的关联越来越小,成为村庄率先进入城市的农户,并且这一阶层的群体城市化水平较高。

半工半耕阶层。半工半耕阶层是村庄的中间阶层,依据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中间阶层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中上层和中下层两部分。中间阶层的基本特点是对土地较为看重,同时务工收入也是家庭中重要的经济来源,通过代际分工或者夫妻性别分工,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由于分田到户的基本原则是按户人均平分土地,因此农户的土地规模及农业收入是差别不大的,拉开农户收入差距的更多的是非农就业及非农收入状况。中上层一般是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并且分工结构较完整的农户,中老年父母在村务农,年轻夫妇在城市务工,大部分人长期务工并且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稳定的务工收入。有些农户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外出务工,但是通过流转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一般种植规模在百亩以上。除了规模种植农户,中上层农户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中,非农业的务工经商收入甚至要高于农业收入。但是由于无法通过务工收入实现城市体面生活,尤其是中老年父母还需要依托土地工作和获得收入,因此中上层绝大多数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只有部分在城市获得相对稳定工作和较高收入的年轻人,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的父母逐渐老去时,可能会逐渐脱离土地。中下层农户虽然也是依托于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但是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相比于中上层都要弱一些,家庭劳动力结构的优化程度也不如中上层。中下层农户要么是父母年龄较大,要么是有年龄较小的孩子需要照料,或者是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身体、文化素质较差,导致家庭劳动力分工结构难以优化,在务工市场的竞争力不足,非农的务工收入较少,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比中上层要高,对土地的重视程度高。在一般农业型村庄中,村庄经济分化并不剧烈,“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因此存在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占村庄农户的 80% 左右,而中上层和中下层在村庄中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区分,并且中下层通过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及家庭再生产的进行,较大可能上升为村庄中上层。虽然中间阶层进城买房比例没有上层高,但是由于数量庞大,因此是村庄买房进城的主要群体,也是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贡献力量。

贫弱阶层。贫弱阶层是村庄的下层,这一阶层大多数是家庭结构残缺、劳动力残缺的农户,或者是好吃懒做缺乏上进心的家庭,比如光棍汉等。下层家庭一般是缺乏壮年劳动力造成的,由于家庭成员患重病或者缺乏劳动能力,无法外出务工获得非农业收入,因此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种植自家的承包地,获得维持温饱的农业产出。由于主要收入来源在土地上,因此下层农户对

土地的重视程度很高。村庄下层农户依靠土地产出以及一些非常简单且持续性差的零工，年收入一般在3万元以下，而家庭的积累性很差，甚至要靠借债来度过家庭困难，这类农户占村庄农户的10%左右。由于家庭经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的生存，因此对于需要花费大量家庭资源的进城买房等需求不大，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所有家庭成员进城生活，这类农户很少有进城买房的，并且对于城市化的预期也不高。

杨村是A乡的一个农业型村庄，全村109户，从2010年之后村民进城买房数量快速增加，全村农户在县城或者所在的地级市买房数量达到30多户，并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比较典型地代表了A乡及其所在区域的整体状况。表1是笔者对杨村农户买房进城状况的统计。

**表1 杨村农户进城买房状况**

| 农户类型 | 村庄阶层位置 | 买房地点 | 买房缘由 | 城市化水平 | 户数 |
|---|---|---|---|---|---|
| 离农户 | 上层 | 少数在省城、地级市，多数在县城 | 城市有固定工作；经济条件好；工作生活便利需求 | 全家进城，城市化水平较高 | 13 |
| 半工半耕户 | 中间阶层 | 县城、少数在中心镇 | 经济条件提升；儿子结婚；孩子读书 | 年轻人进城中老年人留村，处于城市化进程中 | 16 |
| 贫弱户 | 下层 | 县城、集镇 | 结婚压力 | 城市化水平较低 | 2 |

## 三、农民进城的动力及其转化方式

在A乡调研发现，2010年之后村庄农户进城买房居住的越来越多，并且增长迅速。农民买房进城的行为是在乡村社会场域中进行的，村庄熟人社会既是农民城市化实践的起点，也是他们做出进城买房选择的具体环境，日益分化的村庄环境，是农民买房竞争的动力基础。农民城市化的阶层动力是内生性动力，是在具体的村庄场域中通过农户买房竞争转化而来的，是理解城市化问题的村庄视角和农民视角。村庄中的买房竞争加速了农民城市化进程，而买房竞争的阶层动力转化为具体的买房进城行为，则是通过工作、婚姻和教育等现实需求促成的。而农民进城的阶层动力及其转化方式在不同阶层农户中的展现方式是不同的，具体表现为上层主导了进城买房的话语，率先进城买房实现了城市工作生活，而中间阶层农户出于子女婚姻、教育等方面的具体需求，展开了激烈的进城买房竞争，下层农户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群体，进城购房的能力和动力不足。

### （一）发展需求与上层的主动城市化

村庄的上层群体，一般是通过教育、技术性工作、承包工程或者经商等原因，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长期脱离村庄生产生活，使得上层群体对城市生活的熟悉程度和适应感已经超过农村，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通过逐步积累具备了城市购房和生活的经济能力。由于上层群体主要的收入和工作在城市中，生活也是面向城市的，而农村的土地已经流转或者由年老的父母耕作，随着父母逐渐老去，上层群体与村庄的关联会越来越少，有些甚至已经把父母接到城市一起生活。出于城市工作及生活便利性的实际需求，以及向上流动的发展需求，上层群体率先在所工作生活的城市购房进城，并且他们的购房决策大多是主动选择，城市买房和生活对他们的压力并不大。

例如笔者深入调研的杨村和魏村，村庄中读过大学的青年基本都在省会买了房子，最起码也是在所在的地级市买房定居，A乡为数不多的到省会定居和出省发展的人也主要是由于读书和做生意，教育层次稍差或者经济基础不那么强的农户则选择在地级市或者县城发展。这些读书或者经商成功的村民，倾向于选择大中城市定居，主要原因在于A乡处于西北内陆，所在地区并没有很

高的工业发展水平尤其是中小城镇就更加缺乏相匹配的工作或者经商机会,高学历或者经商的人在县城、乡镇的发展空间有限,因此他们追求到大城市发展的动力很强。

**(二)婚姻挤压与买房竞争**

因为婚姻而产生的进城买房竞争,在乡村社会中的转化机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传统的中国家庭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农村婚姻市场的竞争及婚姻挤压。中国家庭具有重要的伦理特征,中国农民最关心的是家庭延续,生育行为最主要的是完成延续香火的任务,农民"过日子"最根本的生活动力也是完成家庭的延续,生儿子传宗接代,为儿子"建房子、娶媳妇"成为父母的人生任务[10]。完成子女结婚的任务是父母和整个家庭的重要责任,也是村庄竞争的重要方面。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因素进入村庄,当前农村的婚姻竞争和婚姻物化都是比较突出的现象。女性在农村婚姻市场的优势地位越来越突出,掌握婚姻市场要价的主动权,"娶媳妇难"成为各地农村的普遍现象[11]。村庄调研发现,有一栋房子最好还是城市里的房子,逐渐成为农村青年结婚的必备条件。杨村的杨二郎今年 48 岁,几年前离婚了,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儿子也到了结婚的年龄,由于身体原因杨叔没有继续做建筑工而是在村里开个小卖店维持生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儿子在县城买个房子,不然儿子是很难结婚的。今年精准扶贫易地搬迁政策补偿每人 2.5 万元,家里算上父母共四个人可以补 10 万元,加上父子两代人共同积攒的几万元,在县城买房应该不成问题了。

根据婚姻梯度理论,城市青年和村庄上层处于婚姻市场的优势地位,而其他阶层的农村青年则面临较大的婚姻竞争,进城买房则成为婚姻竞争的现实物化表现。在婚姻竞争的阶层梯度里,中层和下层都是被挤压的群体,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加上现在婚姻市场中在城里有房子才能谈婚论嫁,婚姻市场要价不断提高,中、下层青年的婚姻成本明显提升。子女婚姻是家庭的大事,是父母重要的人生任务,为了顺利完成子女成家的人生任务,父母是舍得下本钱的,可以把省吃俭用积攒多年的家底全部拿出来,甚至欠下债务,为即将进入婚姻市场的儿子在城里买一套房子,以增加竞争优势。在村庄调研发现,村庄中、下层农户进城买房群体中,有半数以上的是为了儿子结婚需要,不然中老年父母是没有进城动力和需求的。因婚姻压力的进城买房主要在中间阶层和部分下层农户中表现较为明显,村庄阶层分化加剧了农村婚姻市场的婚姻竞争和对底层农户的婚姻挤压,当面临成为光棍的风险时,中层和下层农户纷纷行动起来,跟上由上层和部分中上层农户引领的婚姻买房潮流,进城买房成为完成儿子结婚任务的必要条件。

**(三)教育竞争促进城市化进程**

相较于激烈的婚姻竞争推动的进城购房,近几年乡村社会兴起了因为教育竞争而进城购房陪读的现象,教育竞争推动农民进城成为新的农民城市化途径。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农民的生育观念,农村家庭小型化变化显著,子女数量普遍减少。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转移,进一步减少了农村学龄儿童的数量。加上近些年持续推进的乡村教育改革,很多人数较少的教学点被撤并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向乡镇中心小学和县城集中,乡村教育衰败明显。A 乡原来各个村庄都开设小学,由于学生人数越来越少,近十年各村小学纷纷撤销,学生陆续转移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和县城去。现在全乡只有一所中心小学,虽然在国家大量投资下,学校的软硬件配置都很好,但是近年来乡中心小学的学生依然流失严重,大量的学生转移到县城去就读。原来近两百名学生的中心小学,现在只有三四十人,将近有 1∶1 的师生比,乡村教育的衰败可见一斑。把孩子送到县城去读书并不完全是乡村教育质量问题,更多地转化成一种乡村社会的教育竞争。哪怕孩子成绩不好,也要送到城里去读书,"他家的孩子可以进城,我家的也要进城读书","不比别人差"的思想推动了农户间越来越激烈的教育进城竞争。而由于孩子还小,很多城里的小学并不具备住宿条件,于是家长陪读现象兴起,年轻母亲或者老人在城里租房或者家庭购房进城陪读,成为农户进城买房的另一重要推动力。教育进城在上层农户中率先兴起,而中间阶层紧随其后,随着

乡村教育的衰败,中下层和下层农户寄托于通过子女教育实现向上流动,而被迫把子女送到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只有实在没能力的底层农户才选择让子女继续留在乡村小学读书。近年来,在农民进城买房的群体中,为了孩子教育而进城买房的农户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魏村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村庄,人均六七亩地,农户以种地为主,最近五年魏村农户进城速度很快,已经有20多户在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买了房子,而买房农户中有1/3左右是媳妇住进了城市给孩子陪读。魏军只有40岁,结婚较晚,一个儿子10岁左右,还在读小学,妻子在孩子没读书时在家里种地、养羊,自从孩子读书后就到城里租房陪读了,魏军一个人在家种地并养了100来只羊,忙不过来父母帮着照看一下。以前大家陪读都是租房子,这几年开始兴起买房陪读,于是妻子坚决要求魏军在城里买房子,由于这几年种玉米和养羊的效益都不好,家庭经济并不宽裕,顶不住妻子的压力,魏军向亲朋借了6万元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县城首付买了房子。买房后妻子继续陪儿子读书并没有外出工作,魏军还是继续在家种地放羊,每个月除了供妻子孩子开支,还要还房贷,家庭经济压力明显增加了。

## 四、农民城市化的类型、策略与基础

农村经济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阶层结构处于重塑过程中,农民分化和多元化使得农民行为方式和选择日趋多样化。随着城市开放程度的提高,农民进城的限制越来越小,自由进城与返乡的自主程度增强,当下农民进城更多地体现为农民阶层的主体性选择过程。农民分化和多样化选择,形塑了不同的城市化类型和实践策略,而农民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和策略模式,正是建立在农民"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以及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之上。

### (一)农民城市化的类型与策略

中西部农村进城农户数量不断增加,进城比例持续上升,但是村庄各个阶层的城市化状况及模式存在明显差异。根据城乡关联状态以及农民进城策略选择,可以将农民城市化分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和被动跟随型等三种城市化类型,其背后是农户有主体性地选择,呈现出主动融入城市、弹性进城以及退守农村等策略内容。

主动脱离型。由于当前社会资源的城乡分布不均衡,城市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资本明显多于农村,并且现代化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向城市集聚。随着农民多元分化,一部分农村居民不再满足于农村在城乡结构中的不利位置,而努力实现向上流动。农村中的富人阶层正在逐步走出村庄,他们正是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农民群体[12]。村庄上层为了追求城市便利生活以及获取更多社会资源,选择主动进城,并且逐步脱离村庄。上层农户因为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其主要利益、社会关系以及生活面向等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移到城市,对城市生活的主动融入和预期都很强,并且长期的资本积累也使得上层农户具备了融入城市的资本,甚至已经有部分农户顺利进入城市中产阶层。随着村庄富人脱离村庄,在村庄社会中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壮大了中农群体,他们处在中上层的阶层位置中,并且一部分人还具有通过积累渐渐转化成为富人的潜力,他们是未来可能通过阶层位置上升而逐渐主动选择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的群体。因此村庄上层和部分可能转化为上层的中上层农户,是主动脱离型城市化的担纲群体,他们会选择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甚至成为城市中产阶层。

动态调整型。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不论是进城务工还是居住生活,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务工收入或者务农收入都不足以单独支撑进城体面生活的预期目标,因此大多数中间阶层的农户,即便买房进城了,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城乡关联。由于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农户,并不具备全家进城或者"永久性迁移"进城的经济基础和城市稳定体面生活的能力,因此农村中间阶层农户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着密切的城乡关联,并且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进行

“动态调整”。正是这种密切的城乡关联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农民可以自主进行动态调整,呈现出一种弹性城市化的策略,其核心是农民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进退有据[13]。动态调整的关键在于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做出进城还是返乡的决策调整,而其基础正是在于密切的城乡关联。城乡关联的纽带在于接力式的进城方式以及代际支持。通过家庭的代际分工,年轻子女进城务工或者购房生活,而中老年父母继续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保持着“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而在城市的子女依靠并不多的务工收入难以支撑城市体面生活的需要,农村的父母需要继续依托农业收入支撑子女进城以及在城市的生活。通过代际支持能够顺利进城体面生活的农户,逐步完成城市化目标。而大多数在城市务工生活的年轻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并不足以在城市完成体面安居的目标,这时他们就会退回农村,通过家庭代际接力的形式,继续支持下一代进城,努力实现城市化目标。正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户具有动态调整的空间,保持着弹性城市化的自主选择权,确保了我国城市化的稳定有序,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

被动跟随型。相对于上层和中层在城市化选择中的主动性,村庄部分中下层和底层农户的主动性程度没那么高,为了完成家庭再生产的目标,他们有时需要努力追赶其他阶层农户城市化的步伐。但是其主体性的策略选择空间依然较大,能够退守农村是他们最后的保障和底线策略,因此这一阶层农户的城乡关联程度更强。底层农户由于家庭劳动力结构不完整以及劳动力素质不高等因素,在城市务工收入相对其他阶层农户较少,主要的稳定收入来源在农村和土地,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进城目标。由于子女婚姻等家庭再生产任务的压力,他们也要努力进城买房,这时家庭在农村的收入就是支撑他们进城的资源保障。一部分中下层和下层农户,通过整合家庭和城乡资源,努力追赶其他阶层农户,在城市为子女购买了住房,并且通过父母在农村的劳动继续支持子女的城市生活,因此顺利完成了家庭再生产的任务,继续努力实现城市体面安居的城市化目标。但是大部分底层农户并不具备进城生活完成城市化的能力,甚至连基本的家庭再生产目标也因为无法进城购房而难以完成。但是这部分农户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农村的承包地是最后的保障,努力进城失败后可以返回农村继续生活。因此,底层农户进城需要农村和土地生产的支持,同时农村和土地也是他们退守的最后保障,对土地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阶层。

**(二)农民城市化自主性选择的基础**

姚洋曾指出乡村小农体系提高了农民的保留效用,从而降低了他们进入城市的动机,正是小农体系在农村营造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经济基础,维持了稳定的社会网络,每个农民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也提高了农民进城的心理预期[14]。但是他并未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借助城乡系统提升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动性也是很强的。正是农村自主性价值生产的功能和保留效用,以及农户对体面进城生活提升经济社会地位的预期,使得农户在城市化选择中保持较高的自主性,是农民自发理性的体现。而这种自主性选择的空间和基础,正是建立在农民家庭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以及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基础之上的。

“半工半耕”的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强调的是农村对城市的支持方式,以及农村作为支持农民城市化的“蓄水池”功能。“半工半耕”是农村社会学的中层概念,作为描述和解释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的概念,揭示出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和趋势[15]。半工半耕同时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基本的生计模式,是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正是在半工半耕的家庭劳动力分工结构之下,年轻人进城务工获得非农收入,中老年父母在村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照顾家庭维系基本社会关系,减少了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正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年轻人在城市工作生活,在农村的父母通过从事农业生产继续支持子女的城市生活,构成了中国农民特有的“接力式城市化”[16]模式。半工半耕基础上的接力式进城,为农民进城提供了代际支持,通过家庭资源的代际转移和农村支

持城市的方式,让年轻人迈出了城市化的第一步。同时农村作为农民城市化的起点和保障基地,在农民遇到城市化阻力时,还可以暂时退回到农村,积蓄力量以便日后继续完成城市化目标。基于此,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维持了城乡密切的关联和互动,增强了农民城市化选择的自主性。

"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强调了农民城市化过程中"自由进城、顺利返乡"的模式,保障了农民的返乡权,发挥着"稳定器"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松动,城乡二元结构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已经由过去的剥削性结构变成了保护型结构[16]。构成城乡二元结构基础的户籍制度,其原有的限制农民进城的不利方面已经基本取消,在全国大多数中小城市甚至部分大城市,农民进城已经不再具有限制。与之相反,现在农村户籍本身对农民所具有的保护意义正在开始显现,正是限制城市人和外部资本到农村购房置地的政策,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由于现阶段农民进城还具有不稳定性,随时可能遇到进城失败的风险,正是有农村和承包地存在,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选择返回农村,给了农民自主选择的机会,不至于沦落城市贫民窟。正是这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民城市化进程中保持了自主选择的空间,保留了农民的返乡权和进城失败的退路,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稳定有序推进的制度基础。

## 五、渐进城市化:农民城市化问题的反思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经济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民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但是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弱势地位依然存在。城市化主要是实现农民的城市化,然而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只有村庄少数上层富裕农户,实现了体面进城并且融入城市生活的城市化目标。而农村其他阶层和绝大多数的农户,并没有一次性进城和完全城市化的资本和能力,他们的城市化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依靠家庭合力,通过代际支持实现接力式进城,并且保持较长一段时期的"半城市化"状态。一般阶层农民的进城选择,都是根据家庭状况和现实需求做出的理性化选择,是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城市化策略选择。并且在城市化过程以及半城市化期间,继续保持密切的城乡关联和代际支持十分重要,这也是大多数农民在家乡的中小城市就近买房进城,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17]的现实考虑。农民城市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渐进城市化是农民城市化实践的基本模式。

相关统计显示,按户籍计算的城市化率与按居住地计算的城市化率之间有百分之十几的差距,这中间的差异正是由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造成的。中国农民进城,极少是一次性完成城市化的,而是多次在城乡之间往返,只有当他们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才能真正进城安居,否则可能年轻时进城而年老返乡[4],呈现出渐进城市化的模式。而城市化研究的"城市视角",从农民工市民权的话语体系出发,片面强调农民工完全城市化,并且彻底批判现有的户籍、土地等制度基础。而农村视角的城市化研究,发现农民城市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的"半城市化"状态是一种发展型的半城市化[18],现有的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及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基础,是构成我国城市化特殊道路的基础。在我国城市化快速转型期,农民体面进城安居是"人的城市化"的基本目标,因此保证农民进城自由的同时,保障农民的返乡权利也是十分必要的,现阶段保障农民进城自由和返乡权利的各项制度基础应当继续保持和完善。城市化研究的农村和农民视角,对我国"人的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军.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3):55 - 61,123.

[2]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6 (5):107 - 122,244.

[3]陶然,徐志刚. 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2005(12):45 - 56.
[4]贺雪峰. 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J]. 中国农村观察,2014(1):2 - 12,96.
[5]王海娟. 发现"农村":城市化研究的新拓展——《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述评[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4):22 - 27.
[6]王海娟. 人的城市化:内涵界定、路径选择与制度基础——基于农民城市化过程的分析框架[J]. 人口与经济,2015(4):19 - 27.
[7]杨华. 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J]. 重庆社会科学,2011(5):54 - 60.
[8]贺雪峰.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J]. 社会科学,2011(3):70 - 79.
[9]杨华. 农村阶层分化:线索、状况与社会整合[J]. 求实,2013(8):91 - 96.
[10]陶自祥,桂华. 论家庭继替——兼论中国农村家庭区域类型[J]. 思想战线,2014(3):59 - 68.
[11]桂华,余练. 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 青年研究,2010(3):24 - 36.
[12]贺雪峰. 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研究(专题讨论)[J]. 人文杂志,2014(7):102.
[13]王德福. 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J]. 社会科学,2017(3):66 - 74.
[14]姚洋. 小农体系和中国长期经济发展[J]. 读书,2010(2):20 - 30.
[15]夏柱智. 半工半耕:一个农村社会学的中层概念——与兼业概念相比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41 - 48,153.
[16]贺雪峰.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 东方出版社,2017:100 - 108.
[17]夏怡然.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10(3):35 - 44.
[18]陈文琼,刘建平. 发展型半城市化的具体类型及其良性循环机制——中国农民进城过程的经验研究[J]. 城市问题,2017(6):4 - 13.

# The Driving Force, Type and Strategy of Peasant Urbanization

ZHU Zhan-hui

(*Center for Rural China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o discover and expand the rural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of human beings" should go beyond a single urban perspecti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conomy, the peasant in the Midwest agriculture village are divided into "out of the land" class, "semi- farming" class and vulnerable class, and the peasants'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accelerated. In the background of village class differentiation, the demand for work and life, the squeeze of marriage and the competition of education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s for peasants' urbanization. The mode of farmers' urbanization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peasants' family, showing the basic types of urbanization such as active detachment, dynamic adjustment and passive following type. The "progressive urbanization" model of the peasants' subjectivity is based on the "semi-farming" family livelihood model and the protected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o achieve the "human urbanization" strategic objectives, farmers' independent choice should be respected, farmers' right to return home should also be protected.

**Key Words**: progressive urbanization; class differentiation; semi-farming;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